

“适应论”与“崩溃论”之争 ——伯恩施坦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信用的争论研究

聂大富

摘要：伯恩施坦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信用的争论，是其围绕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争论的一部分。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信用的看法与马克思基本一致，她试图通过反驳伯恩施坦来捍卫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则持怀疑态度，他试图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社会民主党策略的影响。争论表明了双方在方法和社会主义策略上的分歧，即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分歧。历史发展表明，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片面性。

关键词：资本主义信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社会改良；社会革命

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6)04-0024-09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6.04.00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理论和策略提出了颠覆性批评。他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主流看法称为“崩溃论”，而其批评者也针锋相对地把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看法称为“适应论”。在其众多批评者中，罗莎·卢森堡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经常被后人引为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典范。有学者指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大陆，他们两人的名字“长期代表着社会主义运动中相对立的两翼”^①。关于他们两人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争论，学界已多有涉

作者简介：聂大富，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济南250100）。感谢王建民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批评建议。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5CWHJ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统一战线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项目编号：14JJD810016）阶段性成果。

^① Tadeusz Kowalik “Introduction to the Routledge Classic Edition”, in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X.

及^①，但迄今尚未有人就其在资本主义信用问题上的争论进行过梳理和分析。本文将聚焦于这一问题，向读者展现他们的分歧，并探究其背后隐含的方法和策略上的差别。

一、争论的过程

伯恩施坦对“崩溃论”的发难始于1898年《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他指出，当时德国党内占优势地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迟早将有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并扩展成全面的社会危机，结果是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掌握政权，“按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全面改造”^②。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地道的“崩溃论”和“空想主义”，因为现代信用制度对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来说，和人们应当极其注意的生产技术一样，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因素”。在资本财富大幅度增长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商业统计的改进和工业家组织的扩展，都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同时也是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的前提”，社会主义并不因承认这些因素而“丧失丝毫说服力”。他认为“崩溃论”是模糊不清的，忽略了各种工业在性质和发展过程上的重大差别，由于工业适应能力的提高和工业分化的加深，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几乎同时完全崩溃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变得更小了^③。随着个人社会义务和相应权利的完善，随着社会对个人责任和对经济生活监督权的不断扩大，随着各层次民主自治团体的建立及其职能的增加，人们将“会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只要社会能充分行使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将经济企业转为公共经营就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种根本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他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期盼现存制度的即刻崩溃，而应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和民主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④。

针对伯恩施坦的上述观点，卢森堡于同年9月发表了一组文章^⑤，对其进行了全面批评。她认为，伯恩施坦论述的重点不是党的实际任务，而是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她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有三个

① 参见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M. C. 霍华德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1883-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唐纳德·萨松的《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张光明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姚顺良等人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贾淑品的《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世鹏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沈丹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等著作。

②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9页。

③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67页。

④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⑤ 这组文章后来收入《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作为该书的第一部分。

基础：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使其崩溃成为不可避免；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社会化，为未来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基础；三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阶级觉悟的提高，成为“即将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伯恩施坦的“适应论”否定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从而铲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基础，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是崩溃论，要么是适应论，后者将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①。

伯恩施坦把信用看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适应手段之一，并称之为“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因素”，卢森堡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她的理由是：信用作为交换媒介促进了交换的进行，增加了生产力的膨胀能力，使生产的扩张不断超越市场界限，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信用不仅为资本家提供了“利用别人资本的技术手段”，而且还刺激资本家利用别人的财产进行投机冒险，把整个流通变成了复杂的人为机制；信用消除了“一切资本主义关系中的稳定性的残余”，通过信用来调节资本主义，只是暂时平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正是信用把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使一切矛盾发展到极端，把这些矛盾“引向荒谬绝伦的地步”，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因此，信用决不是一个适应手段，而是高度革命的手段，“替资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段应当是废除信用”^②。她认为伯恩施坦的“适应论”表现出庸俗经济学的特点，从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身去寻找病症的解毒药，相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可能性，因而其全部理论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③。

为了澄清观点和回应各方面的批评，伯恩施坦于1899年初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其中专门对卢森堡的批评进行了回应。他指出，他那篇论述“崩溃论”的文章促使卢森堡向他“讲授了关于信用制度和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课程”，而卢森堡关于信用的观点，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献略知一二的人而言都不是特别新鲜。问题仅在于，卢森堡是否正确表达了现实情况。马克思曾强调信用的二重性质，将它看作“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而不是仅仅把它视为破坏因素，卢森堡对这点应该是了解的，但她却只谈信用破坏的一面，不谈它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力”，这是在“断章取义”^④。他认为，虽然历史经验表明“信用使投机容易进行”，但投机通常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和新的工业生产部门最为盛行，一个生产部门越是发达，投机的要素就越难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虽然生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个别工业部门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要使生产过剩导致普遍的危机，除非相关工业部门作为其他部门商品的消费者具有足够重要的作用，以致它们的停顿导致了其他部门的停顿，或者它们通过货币市场的媒介、通过使一般信用瘫痪而夺取其他工业继续进行生产

①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0页。

②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2页。

③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④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14页。

的资金。一个国家越富裕，其信用机构就越发达，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可能性就日益增大，因此信用制度收缩导致生产普遍瘫痪的情况比以前更少了，信用“作为危机形成的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仅就信用作为促成生产过剩的诱发手段这一点而言，在有些地方、有些国家甚至在国际范围内，“生产膨胀愈来愈频繁地遇到企业主同盟的对抗，后者作为卡特尔、辛迪加或托拉斯而企图调节生产”，这种调节对于生产活动与市场情况的影响“已经达到可以减少危机危险的程度”^①。

卢森堡很快于同年4月发表文章^②，对伯恩斯坦进行反驳。她的观点与以往并没有变化，只是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伯恩斯坦所谓信用的“积极的、超越资本主义范围的特性”，是否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地实现；二是信用能否像伯恩斯坦所设想的那样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还是只会使无政府状态加剧。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伯恩斯坦一再强调的“信用的创造能力”作为整个辩论的出发点，不过是在“向讨论范围以外的来世逃避”^③。她认为，伯恩斯坦的理论从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基石出发，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他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趋于崩溃，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剥夺资本家就不可能实现”，放弃了崩溃论也就同时意味着把剥夺、生产社会化、唯物史观、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阶级斗争乃至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放弃了。伯恩斯坦就这样“合乎逻辑地从头走到尾”，为了运动放弃最终目的，但如果没有了最终目的，实际上也就不会再有社会主义运动，其结果“必然是连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掉”，于是他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都崩溃了”^④。

二、从马克思关于信用的观点看双方的争论

在争论中，卢森堡基本上是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批评伯恩斯坦，而伯恩斯坦则认为她是在断章取义地援引马克思。为了反驳卢森堡，伯恩斯坦也同样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回顾一下马克思关于信用的研究和观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两人分歧背后的原因。

首先来看马克思对信用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有一种观点“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互相对立起来”，但这三者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所谓信用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二者“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后者表现为前者的基础。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适应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与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交易形式，人们在这两个经济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来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者之间与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共有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种迷惑性，标志着其特征的似乎只是产品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或商品来生

①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19页。

② 这些文章后来收入《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作为该书的第二部分。

③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④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67页。

产,产品本身的形成要素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或商品再进入生产它的经济中去。但马克思提醒人们注意,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作为生产的普遍性形式的商品生产”,并且在其发展中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中,货币关系或买卖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这种买卖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因此,如果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之,那么“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①。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信用经济只是由货币经济衍生出来的一种形式,它们都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的。这种看法与伯恩施坦把信用视为同生产技术一样的“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因素”,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卢森堡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的思路来看待信用,这是她与伯恩施坦分歧的核心。

关于信用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提供了在一定界限内支配他人资本和劳动的权利,使其获得对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的支配权。资本家借助信用来使用社会资本进行冒险,无论成功或失败其结果都会导致资本的集中,导致对直接生产者和中小资本家的剥夺。这种剥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也是其目的,而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②。信用不仅是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的基础,还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而股份公司与合作工厂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③。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信用的作用下“被强化到了极限”,因而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这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发展到一定的限度”,这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一种内在的束缚和限制,但这种束缚和限制又会不断地被信用打破。因此,信用加速了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也就是说,信用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即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一种赌博欺诈制度,并使剥削社会财富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它造成了“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④。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信用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极地扬弃其自身内部的对立;二是不断地打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束缚和限制,加速生产力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三是加剧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为新生产方式提供过渡形式。卢森堡关于信用对资本主义影响的看法,与马克思并没有区别。至于伯恩施坦说她断章取义,只强调信用的破坏作用,忽视信用的创造性,只是因为她为反驳伯恩施坦把信用视为适应手段的观点,更多地强调了信用加剧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这一点。不过,卢森堡也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比如她认为“替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4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0页。

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段应当是废除信用”。既然信用的性质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的，她也不同意伯恩斯坦把信用视为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因素的观点，问题在于，废除信用又怎么可能成为“替资本主义寻找的第一个适应手段”呢？

三、从争论看二人在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

伯恩斯坦和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信用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伯恩斯坦视之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卢森堡则认为它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崩溃。争论表明了二人在方法上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主张上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在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者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①。

两人在方法上的分歧是这场争论的根源。伯恩斯坦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都进行了批评。他曾表示，德国社会民主党既然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自身行动的理论基础，这就意味着，党虽然代表一定的利益和倾向并为自己确定的目的而斗争，但党在确定自身目的时必须在决定性的方面遵循“完全依靠经验和逻辑作为证明材料并且同经验和逻辑吻合的客观证据”，因为无法提供这种证据的就不是科学，而是以主观灵感和想象为根据的单纯愿望^②。他对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历史必然性比较反感，认为“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他们相信“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④，但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把意识和存在“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⑤。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但伯恩斯坦对这一说法表示反对，认为这句话带有宿命论的音调^⑥。

对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伯恩斯坦同样表示反对。他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如果人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进行思考，“就要陷入派

① 围绕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8年斯图加特、1899年汉诺威、1901年卢卑克、1902年慕尼黑、1903年德累斯顿五次代表大会上都进行了激烈争论。在这几次争论中，党内形成了“改良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对立，前者为伯恩斯坦辩护，后者在批评伯恩斯坦的同时，力争捍卫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和策略主张（参阅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史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此外，在欧洲范围内，法国的拉法格、英国的贝尔福特·巴克斯、荷兰的潘涅库克、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以及俄国的帕尔乌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都对伯恩斯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参阅沈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181页）。

②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138页。

③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⑤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⑥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生概念的世界”，陷入“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如果依据辩证法的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就会有任意构想的危险，涉及的事物越复杂，危险就越大^①。他批评马克思、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发展出“与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这妨碍了他们“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导致他们出现这样的矛盾：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表现出非常细致的、同天才的勤奋相当的精确性”，但同时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忽视明摆着的事实”；他们“以经济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却归结为对暴力的创造力量的奇迹信仰”^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伯恩斯坦认为要想就信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作出判断，必须根据现实的发展变化才能得出结论，而不是像卢森堡那样“依靠辩证法的焰火把信用制度作为适应手段的能力说成‘昙花一现’”^③；不能仅仅依靠援引某种理论上的必然性，更要注意现实的发展和各种因素的反作用。

卢森堡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卢卡奇在一篇研究卢森堡的文章中曾指出，辩证法同资产阶级科学的决定性区别，并不是将经济动机放在首要地位来解释历史，而是坚持总体的范畴，强调“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整体的因素，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随着研究对象的分离和科学的分工与专门化，虽然产生了某些专门的抽象概念，各个领域内诸因素的抽象孤立化也不可避免，但决定性的问题始终是：这种抽象孤立化“是否总被并入作为认识的前提和由认识所要求的真实的总联系”，对孤立的局部领域的抽象认识是否保持着自律，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压根儿就没有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或历史学，只有一门统一的关于作为总体的社会发展的科学^④。卢森堡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础的阐述，表明她明确地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严整的总体，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紧密相关，而伯恩斯坦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性这一基础，结果只能把社会主义变为一种抽象的价值追求。卢森堡还敏锐地注意到伯恩斯坦“适应论”在方法上的特征^⑤，即把所要研究的一切经济现象不是放在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视野中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联系中割裂开来，当作独立的存在。伯恩斯坦之所以把信用视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正是因为他看不到信用如同货币、商品和资本一样，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有机的一环。而卢森堡则意识到，如果把信用看作交换的自然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并且看到它“同资本主义交换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有联系”，那就不会将其视为“适应手段”，正如不能把货币本身、商品和资本视为适应手段一样^⑥。

这场争论还表明了两人在策略主张上的分歧。伯恩斯坦表示，他并不认为社会

①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158页。

②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2页。伯恩斯坦承认，他反对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表达得有些过分尖锐”，但他解释说，如果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黑格尔有些苛刻，“那么这肯定不是为了贬低马克思和恩格斯”（见《伯恩斯坦文选》第162页的注释）。

③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页。

④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7-78页。

⑤ 伯恩斯坦自己也认为，卢森堡的文章就方法论而言，是反对他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见《伯恩斯坦文选》第325页）。

⑥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7页。

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①，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既指社会进步，也指为促成这一进步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②。他相信，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权将逐渐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越是民主化，发生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会越少。无产阶级并非只能通过政治灾变夺取政权，不断地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社会民主党持久的成功。民主机构的增加将会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过去通过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现在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③。他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民主的改良政党，参与地方和全国议会选举，通过在资本主义内部推行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措施去实现社会主义^④。

卢森堡则恰恰相反。在她看来，夺取政权是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与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以及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就是一切^⑤。她认为，伯恩斯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无非是劝社会民主党放弃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如果依照伯恩斯坦的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将会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资本主义形式上，使社会化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变得多余^⑥。关于伯恩斯坦寄予厚望的民主制，卢森堡认为，虽然从形式上看民主制是用来在国家组织中表现整个社会利益的，但实质上所表现的仍然只是资本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它形式上虽然是民主的，但就内容而言仍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代表所牺牲。因此，寄希望于使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是只考虑到了民主制的形式，而完全忽视了其实质内容，民主制并不像伯恩斯坦设想的那样“是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使资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发展起来的特殊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其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单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不但无法打垮这堵墙，反而会使它更牢固；要打垮它，“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⑦。

结 语

伯恩斯坦和卢森堡关于信用问题的争论，涉及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争论

①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②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③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41、72页。

④ 参见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6-314页。

⑤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38页。

⑥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⑦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1页。

过程看,双方都援引了马克思,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某种根据。但我们更要注意到,双方在争论中表现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是不同的。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关于实际情况的更为正确的认识,对其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应用影响不大,往往只是对个别新论点作了肯定,且有时自相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重新使理论获得统一性以及重建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的任务留给了后继者,但后继者只有在对其理论的缺陷和矛盾进行无情清算后,才能完成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伯恩斯坦指出,他所面临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墨的人固然很方便,但对于那些只要还保留着一点理论感的人而言,只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逢到节日才拿出来欣赏而平时却置之不理的观赏品,他们一旦认识到这一理论中的矛盾,就会感到有清除它们的必要性;学生的任务正在于此,而不在于永远重复导师的话^①。因此,伯恩斯坦试图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来批判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改变。卢森堡则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她敏锐地注意到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所蕴含的策略主张与她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主张之间的差别,即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对立。正因如此,双方争论到最后依然各执一端,也就不奇怪了。

历史发展表明,信用并没有使资本主义获得伯恩斯坦所认为的那种适应能力,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和平渐进的改良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也过于乐观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以各种方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经济前提,但要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还必须像卢森堡指出的那样,由无产阶级政党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去夺取政权,对资本主义实行改造。但是,在认识到信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限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它给资本主义带来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信用的发展,银行将会在资本主义中占据重要支配地位,“那种以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量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本集中手段,它给予银行家“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性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还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办法来干涉现实生产^②。在信用制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金融资本,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趋势,使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呈现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国家权力与金融资本结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越发明显、资本的民族性更加突出、国家作为总资本家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等一系列特点。因此我们不能像伯恩斯坦那样,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经验有不符的地方,就去否定它的根本方法;也不能像卢森堡那样,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抽象原理出发去反驳对手的批评,而不注意现实的新发展。短视的经验主义和僵化的教条主义都无助于人们把握现实,在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时,应更多注意其复杂性和多变性,慎言“适应”或“崩溃”。

(责任编辑:蒋锐)

① 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1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8页。